社会学研究 2003年第2期

费孝通文化论初探

王延中

Abstract: Professor Fei Xiao-tong is one of the world famous Chinese sociologists due to his socio-anthropology community studies on civilized nation. Culture theory is one major part of his community studies. This article draws the theoretically origins of his culture theory which was based on Malinovski's functionalism and dynamics culture theory. His "diversified origins with one core" theory is not only identified significantly in Chinese nation history, but also useful to explain the trend of the world's culture phenomena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all other nations' cultures need to be re-identified through cross-culture communication and self-consciousness to learn to tolerate and admire each other in order to create general common consensus of the world. All nations holding their own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can exist peacefully with the general common consensus as the global culture roots.

费孝通是进行实地社区研究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通过对迅速变迁着的中国社会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考察思索,他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人类学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开创和发展了社会人类学的中国社区研究学派。文化研究是费孝通的社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将随着费孝通本人的学术回顾与反思,简要梳理其文化理论的来源,介绍其"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格局理论和他对中华文化重新定位的思想。

文化功能动态论的理论渊源

任何社会现象都可以被视为文化现象。文化问题成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或者说核心领域。这也是费孝通一生研究的主题之一。费孝通认为,人类学也好,社会学也好,从一开始,就要认识文化,认识社会。所谓文化,就是"人造的人文世界"(张冠生,1999: 564)。这个人造人文世界是共同生活的人群在长期的历史当中逐渐形成并高度认同的民族经验,包括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伦理准则、社会理想、生活习惯、各种制度等等。这些在千百年的历史中形成的民族经验,具有相当的稳定性(费孝通, 2001, 15 卷: 407)。

文化的稳定性成为人们认识文化的特征与功能的前提。文化的特征包括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从 广义上说,文化就是人类社会的组成部分。它与人类自身的生物特征相联系,但它绝不是通过生物遗传得到或传播的,而是通过人类群体的社会活动、社会组织和相互交往产生和传播的。这种文化之所以产生和传播,是因为它具有满足人类社会需要的功能。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基本上是对人类需要的 反应"(邓肯.米切尔主编,1987:76)。费孝通刚刚进入社会人类学大门的时候,正是理论界从社会进化论向功能主义理论大转变的时期。当时高举功能主义理论大旗的就是费孝通的博士论文导师马林诺夫斯基(同时代的 A.R. 拉德克里夫一布朗更详细地阐述了社会功能主义的理论体系),他不仅明确提出文化是为了满足人们基本需要的主张,而且建立了文化功能论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强调将一个社会(尤其是原始部落社会)作为社会文化的整体来分析,各种社会组织制度及其相互联系,都具有满足社

会各个成员的基本需要(特别是生物需要)的意义,并应从这个方面做出解释。做出解释的方式离不开实地观察、收集资料及切身体验。为了更好地进行实地观察,马林诺夫斯基还设计了"文化表格"作为参考体系。这个参考体系涉及到文化是什么、文化包括些什么、文化是怎样发生的、文化各部分间有什么关系、观察文化的范围是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等等问题(费孝通,1999,13卷:396)。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功能论及其研究方法,深刻地影响了进入社会人类学领域的费孝通,并很快使他成为文化功能论的追随者。费孝通在1933年初完成的《人类学几大派别——功能派别之地位》一文中,认为功能学派在人类学发展史上占有极重要的革命地位,因为它在根本的概念和方法上,进行了极其有系统的改造。功能主义通过整体论的实地研究,能够总结出文化各部分间及部分与整体间结构的功能关系和一般的原则。因此,它是科学的性质而不是历史的性质。功能学派在人类学发展史上的最大贡献,"就是将人类学从历史性质(进化论)转变为科学性质"(费孝通,1999,1卷:75)。

费孝通最早接触社会人类学和功能学派是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在那之后,他对功能主义的学习和实践都不断走向深入。他不仅认真学习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功能论,并有幸在伦敦经济学院直接跟随马林诺夫斯基学习其文化动态论。在整个学习过程中,他不仅认真翻译了从吴文藻老师那里得来的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还走出学校,用功能主义理论和方法指导进行了大瑶山调查、江村调查。回国后在艰苦的条件下不仅进行了不同类型的"云南三村"调查,而且完成了一系列理论著作。其中一部《乡土中国》详细分析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基本结构,影响深远。另一部《生育制度》则是关于生育问题的社会功能主义研究,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学术性。正是这些调查研究和理论著述,形成了费孝通的第一个学术高峰期。40 年代中期之后直到 90 年代初期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由于政治动荡、学科调整、社会隔离、恢复重建社会学等外在因素的影响,费孝通失去了系统深入地进行文化问题实证研究的条件,尽管他对文化问题的思考和论述一直没有中断过。

进入 90 年代之后, 费孝通在"行行重行行"的任务间隙, 把学术反思作为他的一个学术重点。1996 年出版的《学术自述与反思》收录了他 15 篇关于学术自述性质的文章。其中 1995 年完成的《从马林诺 夫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一文,再次系统地回顾了半个世纪前他如何学习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功 能理论的心路历程。文中重述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理论要点:文化是人为的;文化是为了人的生活 的,是生活得以运行的手段:文化是人作为社会成员创造的,不但要依靠前人已有的文化基础,而且要跟 别人合作,才能继承和创造文化;文化是对自然世界的加工,没有脱离自然世界的人文世界;人文世界有 许许多多组成部分,但不是各自独立的零部件,而是在相互联系、配合、互动中构成一个体系的整体(费 孝通, 1999, 13 卷: 402)。 费孝通在这些论述中强调了人文世界与自然世界的连接,强调了马林诺夫斯基 的文化论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联系。这与 50 年前费孝通重视文化功能论、批评进化论有很大的不 同。有了自然世界的基本支点,费孝通90年代中期对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的认识更进了一步。马林 诺夫斯基的文化论从物质设备、精神文化、语言、社会组织四个方面构建了人文世界的大框框。费孝通 依然坚持马林诺夫斯基的"朴实文化论"的基本观点。因为所有这些人文世界的框框都是为了更好地满 足人们的需要,尤其是人们的生活。生活是活人的活动,文化是活着的人文世界。人是体、文化是用。 文化的用途可以满足基本(生物)、派生(社会)、整合(精神)三个层次的需要。问题的关键是三个层次的 关系。马林诺夫斯基以基本(生物)需要作为基础。费孝通在《生育制度》里面更多强调了社会需要,直 到 90 年代通过重新学习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和潘光旦的新人文观点, 得出了新的见解: 文化仍然是 建立在满足人们基本(生物)需要的基础之上,但"文化不但不仅是用来满足人的生物需要而且可以用来 限制人的生物需要"(费孝通,1999,13卷:415)。可以说,经过90年代的反思,费孝通已经从人是"生物 人"还是"社会人",是"神(GOD)"是"兽(BEAST)"的二律背反的矛盾中解脱出来,在修正了马林诺夫斯 基的过分重视文化的生物功能的同时,真正体会到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的整体性。 这是费孝通关于 文化问题的学术思想的发展,同时为他从静态的"文化功能论"转向动态的"文化变迁论"打通了关节。

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功能论影响很大,但他同时也是文化动态论的大师。费孝通曾经有一年的时

间学习他的文化动态论,但是系统研究马林诺夫斯基《文化动态论》的著作却是在 1997 年暑期之后。费孝通于 1998 年 3 月完成了《读马老师〈文化动态论〉书后》,作为他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的讲稿。 这篇"书后"大大扩展和深化了对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的认识。在相对孤立、封闭的小社区中,文化的变动是缓慢的。随着实力差别巨大的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各个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相对弱小的文化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形成了文化变迁的动力。 马林诺夫斯基晚年对非洲的实地调查,已经明显感到了西方文化对非洲文化的冲击。他描写的太平洋小岛 Trobriand 是个孤立的、封闭的、静态的文化,他由此看出了其中的文化表格即文化的结构,写出了《文化论》。他在非洲看到了殖民主义的大肆扩张对非洲文化的巨大影响,当地的原有文化快要被西方殖民主义破坏了。 这种变化尽管是他不愿看到的,但无法阻挡。从这段经历当中,马林诺夫斯基看到了一个正在发生文化巨变的社会,看到了文化变迁的事实,写出了《文化动态论》。 费孝通认为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动态论》不仅仅是马林诺夫斯基本人学术思想的发展,也是"人类学历史上的一个很大的转折,从静态的分析转向了动态的研究"。由此进一步奠定了马林诺夫斯基在人类学上的贡献,"就是实现了从书本到实地调查,从静态研究到动态研究,并倡导从野蛮人的研究转向对文明世界的研究"(费孝通,1999,14卷;376)。

在费孝通看来, 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应当包括文化功能论和文化动态论两个基本组成部分, 是文化功能论和文化动态论的有机统一, 是"文化功能动态论"。这里面体现了马林诺夫斯基学术思想和研究思路的发展, 也体现了费孝通对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的重新认识。这个认识意义重大, 它揭示出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必须反映时代的变化, 必须回答时代的要求。

走向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格局

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必须反映时代的变化,并帮助人们适应这种变化。这是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优良传统,也是费孝通的一贯主张。费孝通从事学术研究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为了认识社会、解释时代和解决实际问题。他要建立的就是这样"一门为人民服务的人类学"(张荣华编,1999:171)。费孝通从开始学习社会学直到80年代末期,一个中心任务就是通过社会学、人类学的调查研究,帮助中国找到实现工业化使广大农民摆脱贫困的"富民"之路。到了80年代末期,中国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富民政策初见成效。费孝通关注的领域转向了更广阔的外部世界,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冲击问题。这个冲击的广度和深度,远远大于马林诺夫斯基所处的30年代末西方殖民主义在非洲扩张时对当地文化的冲击程度。当时的冲击是局部的、单向的(主要是殖民主义冲击当地文化)、相对缓慢的,现在的文化接触则遍及全球,由于交通通讯和技术进步,人员、资金、信息、商品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流动,大大加快了各民族之间、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和相互渗透,几乎影响到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每一个国家及其人民,全球好像也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大社区,世界也朝向地球村文化发展。"人类要适应这种变化,就要能解释这种变化,知道它如何变化和走到哪里去,这应该是社会学者的任务和责任"(费孝通,2001,15卷:275)。

费孝通深切地感受到文化变迁的全球化趋势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1989 年他在"21 世纪婴幼儿教育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由于客观世界改变了,21 世纪的世界将不同于 20 世纪。 20 世纪的世界有点像世界范围的战国时期,也就是正在发生着世界范围的,或全球性的,从分到合的运动。这个运动就是由于"世界大战"等全球性事件组成的一体化发展趋势。 世界不同部分逐步从分离的、相互隔离的状态变成互相联系、休戚与共的整体,即"世界一体"(one world)。 这个整体不仅是物质层面和技术层面的,尽管世界各地发展不平衡,同时它也是文化层面的,尽管文化是多样的、多元的并在多元的基础上向着多样发展(费孝通, 1999, 11 卷: 525)。 10 年后,费孝通在"21 世纪人类的生存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再次指出了全球化对民族国家及其文化的全面冲击。 在 20 世纪之前的漫长时代里,国与国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界限是社会构成的关键,不同的政治、文化和区域实体依靠这

些界限来维持内部的秩序, 创造它们之间的关系。在 21 世纪, 20 世纪那种"战国群雄"的面貌已经受到一种新的世界格局的冲击, 民族国家及其文化的分化格局将面临着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更新自身的使命(费孝通, 2001, 15 卷; 280)。

21 世纪世界一体的发展趋势日益强烈。费孝通分析了这种一体化发展的内在原因。从物质的层面看,技术进步尤其是信息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全球范围的产业调整和经济社会类型的转变,即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到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密切合作的社会转变。信息技术带来了全球性的信息社会、网络社会,尽管信息社会的发展普及尚需时日,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仍然延续着。在这里,费孝通看到了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但同时指出"经济社会形态的演化不是单线的进化",社会发展过程十分复杂。他明确反对经济社会形态是直线历史上升的简单化论述。

从逻辑关系上看, 费孝通认为今天的全球化, 是马林诺夫斯基半个多世纪前看到的文化变迁过程的继续。"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的广泛的文化接触的变化线路, 是马老师生前已经预见的, 我们看到的无非是这一股潮流的进一步扩大"(费孝通, 2001, 15卷: 284)。由于封闭社区的格局被打破, 认识文化接触带来的社会文化变化, 就必须像马林诺夫斯基那样在认识方法上有所转变, 使研究方法更加符合研究对象的实际。马林诺夫斯基早期采用"文化表格"方法研究静态社区, 30年代末期研究非洲文化变迁则采取动态的"三项法", 即把研究对象分为三种类型: 西方文化、本土文化和二者冲撞着变动中的殖民地文化。后来马林诺夫斯基把三项法扩展为"五项表格"。①值得说明的是, 费孝通 90年代以后关于全球化趋势的论述, 虽然延续了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思路, 但没有完全照搬马林诺夫斯基的三项法或五项法。由于时代的变化、技术的进步、传统文化的复兴, 当今世界的全球化虽然仍然体现了西方文化的主导性作用, 但是经济落后的国家与地区毕竟获得了政治独立, 其相对弱小但丰富多彩的多样文化在受西方文化冲击的同时, 也在全球文化多样性的进程中扮演着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 不完全是被动的。这与马林诺夫斯基看到的被动承受西方殖民主义冲击的殖民地文化是不同的。

费孝通不仅看到了全球化的趋势,更希望人类学、社会学认真研究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功能及其动态变化。他认为这是时代赋予人类学和社会学的重要任务。因为人类学、社会学要从本质上研究"人与人、族与族、国与国怎样共处的问题"。这主要不是技术、物质层面的问题,而是"心态"和文化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地球越变越小、接触越来越频繁、使"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种族与种族、宗教与宗教等等之间的公共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如何处理这种复杂的关系,当今世界似乎尚未有更好的方式。但如果仍面向过去,主要依赖在小社区中获得的经验似乎不是合理的解决办法。"早期由部落和血族斗争所遗留下来的那种以对抗来解决矛盾的办法已因科技发达逐渐失去其实际可行性。这个一发牵全局的世界,星星之火,足以燎原,超常毁灭性的武器所威胁的不只是斗争的对方,而且将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人类的生存。这一类矛盾必须避免发展成非常严重的对抗性质"。但令费孝通感到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针对这种威胁的思路却还是从减少或销毁这类武器本身着眼。20世纪的整个年代似乎还没走上更理想的道路"(费孝通、1999、11卷:529)。当今世界最强大的美国遭受"9.11"攻击后,其报复性行动基于"以牙还牙"的原始性心理反应、它"以反对恐怖主义的正义名义进行的这场战争造成了大量无辜人民的死亡和遭殃",成为"以恐怖手段反对恐怖主义的例子"(费孝通、2002;12)。同样,至今流血不断的巴以双方,越来越把自己陷入"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这说明 21 世纪初的状况依然如故。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问题变得十分必要和迫切,这是关系到整个地球村的居民如何和平共处的大问题。

从研究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融合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经验出发, 费孝通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目前已经到了形成"全球性文化"的时机。20世纪之前, 地球上并不存在一个牵连着所有人的一脉牵全局的大网络。这个网络在20世纪后期才出现。全球社会必然出现

① 马林诺夫斯基的五项表格是: A 白人的影响(利益和意向); B. 文化接触与变迁的进展; C 传统的遗留情况; D. 过去的重构; E. 非洲人自发的再整合与反映的新力量。(费孝通, 2001, 14 卷; 363)

全球性的文化,包括世界范围的组织、制度、行为方式和思维逻辑。当然,全球性文化还仅仅处于初期阶段或者说形成的早期,目前还看不出其内在的有机联系,其内在结构、功能发挥和变动趋势的基本特征还不十分清晰。

费孝通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观察,提出了对目前全球性文化发展的一些认识和判断。首先,全球性文 化是"多元的"。费孝通赞同人类起源的多元论。文化多样性是一个与人类同时出现的事实。他说,"人 的世界一开始是多元的,而且在多元的基础上向着多样性发展"(费孝通,1999,11卷:525)。其次,他承 认全球性文化将来会是"一体的"。他认为现代化既是全世界人民面临的共同趋势,就应当包括经济的 趋平和文化的趋同。在一个社会中,假如没有一套传递信息的共同符号,人和人的往来和行为上的配合 是不可能的。因此,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中存在着文化趋同的一面是不能否认的。再次,全球性文化的 一体化趋势及多元化共存是"统一的"和并行发展的。在进入世界一体的过程中,文化的多样性相互碰 撞形成了全球性文化的两个层次,共同层和多元层,多种文化集体也正在各个层次发生着两种不同的倾 向,不同的地区侧重点稍有差异。美国、加拿大文化的共同性较强但仍然存在无可否认的多样性,欧洲 文化上的多样性的存在和发展似乎胜过了文化上的共同性。亚洲、非洲、南美洲等地方文化的多样性更 加明显。可以说,在现代化进程中和相当长的时期内,"文化上的共同性和多样性是并行发展的"。费孝 通还提出了"文化自觉"和"文化相容"的全球性文化发展途径。在"多元一体"、"多元共存"的全球性文 化体系中,各不同文化主体如何为自己定位、如何与其他民族的文化相处,需要形成不同于传统封闭社 区的新思路。从民族文化自身来说,民族国家及其文化的分化格局面临着如何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纪中 更新自己的使命。实现这个使命需要"文化自觉",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对 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同时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在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基础上, 还要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身文化的关系。通过相互接触提高自我认识,达到相互理解、相互宽容和多 元并存, 使不同文化能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新世纪中华文化的定位

中华民族拥有 5000 年连绵不断的发展史, 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这在世界上是独树一帜的。在全球化背景下, 中华民族的文化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是如何加快自我更新, 一是如何与其他文化多元共处、共存共荣。这是建设全球性文化的出发点, 也是中华文化新世纪面临的两个基本任务。

费孝通认为,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一个迫切课题是实现自身的推陈出新、继续发展问题。这也就是他提出的通过文化自觉方式,为中华文化在新世纪进行定位。其目的是形成对自身文化的自知之明,以"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孝通,1999,14卷:404)。要实现对中华文化的自知之明,需要研究它的四个主要方面,即"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势"。

在中华文化的来历和形成过程方面,费孝通在 80 年代曾进行过认真仔细的梳理。其主要成果是 1988 年完成的、引起广泛共鸣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中华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它的主流是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在这个过程中,距今 3000 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的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形成的华夏及后来的汉族,成为整个融合的核心。它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进了这个核心,并渗入了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这个疆域内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费孝通,1999,11 卷: 281—382)。应当指出,费孝通在 90 年代末期提出全球性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思想,借鉴了中华民族文化形成过程的经验。他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也许是世界各地民族形成的共同过程"。

只不过今天世界多元一体的全球性文化的范围更大,也更加复杂,由于其"共同层与多元层"各自的定位和相互关系总是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全球性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还处于形成的初期。

对中华文化基本特征的分析,是费孝通文化研究的一个重点。鉴于中华文化的悠久历史,费孝通根据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把中华文化分为三个大的时期,即他自己总结的"三级两跳"。"三级"是指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三种基本社会形态,^①"两跳"是指同时经历的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又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社会变迁过程。

对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演进过程的研究,是费孝通一生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也是他从事的最 主要的学术工作,即"了解中国如何进行工业革命"(费孝诵,2001,15 卷,320)。这个过程时间很长,一直 持续到现在。从3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是他进行这一研究的第一个时期。这期间他在社会人类学调查 基础上撰写的《花蓝瑶社会组织》、《江村经济》、《云南三村》,实证地分析描述了农业社会的经济社会结 构及其在外力冲击下的变迁过程。这种变迁就是中国从传统的乡土社会开始变为一个引进机器生产的 丁业化社会。对这一时期中国农业社会基本文化特征的分析,主要反映在他撰写的《乡土中国》、《生育 制度》、《皇权与绅权》等著作中。由于本文篇幅所限,难以详细介绍费孝通关于"乡土文化理论"的全貌, 但从上述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对乡土文化一些基本特征的概括,诸如,乡土本色(指直接靠土地为生的人 粘着在土地上),差序格局(以自己为中心外推的非等距离的社会关系网络),家族依赖,世代继替,礼制 秩序(通过家庭伦理关系而不是法律维系社会秩序),长老统治(通过"教化"形成的服从"权威"的权力结 构), 名实分离(强调"面子"而非实际甚至到了虚伪的程度)、道统(维持政治规范却无政治权力的士大夫 阶层及其理论学说)政统分离等。我曾经在《中国价值观的演变》一文中(Wang Yanzhong, 1999: 13—63) 结合费孝通的有关论述, 指出中国乡土文化的基本价值倾向是"群体本位意识"。在群体本位的价值理 念和重视整体性思维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中国乡土文化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征:(1)"中庸之 道",不走极端。(2)集团(体)主义。集团(体)主义是中国社会中最流行的一种观念,也是群体本位和群 体意识的集中体现。只有为集体谋利益和献身的人,才被这种文化所认可、宣传和推广。如果过分考虑 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尤其是明目张胆地追求个人的价值和独立性,则很难在社会中立足。(3)矛盾求 和。"以和为贵"是中国人追求的一种理念和人际交往的基本准则,追求平和、宽容、顺从、团结,使大家 相互尊重、相互依赖, 而不要过于突出自己。(4)重视人情、面子和关系。 中国人重视关系甚于重视法 律,法律和规章制度在关系面前会失去威严和庄重。(5)差序格局,内外有别。这些规则反映的是一种 宗法等级观念, 与西方社会的平等观念是不同的。这种"内外有别"的观念和行为原则在中国文化中特 别明显,不这样做就会成为一个"不通情理"的人,受到他人的鄙夷。(6)现实主义。在农业社会物资供 应不足且不稳定的情况下,中国人考虑的主要是现实生活的需要,比较看重物质层次的满足和现实社会 中的地位。很少有人真正信奉宗教信仰,也不把宗教看作是多么大的事情,往往把宗教作为一种实现现 实生活要求的工具或摆脱现实生活的无奈归宿。(7)伦理道德主义与双面性。在重视人情、关系和面子 的社会中,伦理道德是维持这个差序格局正常运转的根本。当然,在乡土社会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并 没有单纯到仅仅依靠"德治"和人们自觉的地步,还有法律、制度等外部的约束监督。 由于这些概括并不 全是从费孝通书中得来的,不一定符合费孝通乡土文化的本意,不当的地方责在笔者。

新中国成立之后, 费孝通关于中国如何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化国家的研究, 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 不像前一个时期的社会人类学调查那样深入和具有实证性, 但他仍然利用各种可能进行力所能及的实地调查, 几乎走遍了从沿海到边区的山山水水, 走一路写一路, 从个案分析到类型比较, 写出了相当数

① 费孝通老师提出的三种基本社会形态并不是指人类社会的整个发展历史。在新石器时代(公元前1万年至公元前5000年)人类就开始了定居生活。也出现了最原始的农业。距今7000年的中国良渚文化赶上了这一时代的末期。西方学者把世界文明史分成苏美尔时代(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巴比伦时代(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雅典和罗马时代(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800年)、封建主义时代(公元800年至公元1100年)、贸易时代(公元1100年至公元1500年)、殖民主义时代(公元1500年至公元1750年)、工业化时代(18世纪和19世纪)、后工业化时代或信息时代(20世纪中期以来)。参见玛丽安贝尼托、《财富编年史》、转自2002年7月2日《参考消息》。

量的文章。到 2001 年 10 月为止共计 15 卷 500 余万字的《费孝通全集》,后 8 卷(从 1981 年开始)是在他进入 70 岁高龄并担任繁重的社会工作的情况下写成的。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费孝通一直主张的"机器下乡"即农村工业化以"乡镇企业"的名义"异军突起",成为推进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化的主要力量之一。随着中国工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经济已经告别农业社会常有的"短缺"状态,成为"过剩"经济。由于拥有劳动力成本优势,中国目前正在成长为"世界制造业大国"或"世界工厂"。费孝通亲眼目睹了中国的工业革命进程(尽管这一过程仍将以实现"工业现代化"的名义继续进行),看到了自己"志在富民"愿望的实现,同时又赶上了信息时代的到来,即"从工业化走向信息化的时期"。

对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变化,费孝通没有第一个时期《生育制度》和《乡土中国》那样的理论性 专著,但这并不妨碍他一直关注文化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很强的理论洞察力的文章和著述。 我认 为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从小培养二十一世纪的人》、《中华文化 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对文化的思考》等,当然还有一系列的"反思"、 "回顾"、"对话"和重新学习的文章。这些著述概括了一些新的概念,诸如,多元一体、文化自觉、美好社 会、全球文化、三级两跳等等。这些概念不完全是对处于变动过程中的中华文化基本特征的系统概括、 而是费孝通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的背景下,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特色"及其作用和发展趋势 的尝试。与前一时期的文化研究相比,费孝通不是单纯地进行文化理论的分析,而是希望能从中华文化 的传统中找出对现代中华文化建设和世界文化建设仍然有价值的成分,作为中国乃至世界各国人民都 能接受的一些"共同规则",实现中华文化的推陈出新和继续发展,形成现代中华新文化,同时实现世界 多元文化的和平共处、各施所长、联手发展(费孝通, 1999, 14 卷:409)。 费孝通在 1998 年同李亦园先生 的对话中,明确提到了要研究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背后的"中国文化特色" 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下去的大题目,并概要地归纳了一些主要的文化特色。其中一个 特色是中国文化的继承性和世代传承的力量,这是中国的活力,因为世界上还没有像中国文化继承性这 么强的文化。第二个特色是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中华民族的形成是多元的,多元的文化形态在相互接 触中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共同形成中国民族"和而不同"的包容性文化。"一国两制"的例子 说明,中华文化承认、允许不同的东西相互沟通、相互交融、相荣相处。 推而广之,世界各国的不同文化 也应当互相尊重、相互沟通、和平共处,而不是像西方学者亨廷顿那样主张不同文化之间只有对抗和冲 突。第三个特色是强调"平衡和谐"、讲人己关系、提倡"中和位育"和天人合一。能想到人家,不光想自 己,是中国人际关系当中很主要的东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设身处地,推己及人。 这里面体现的是"以和为贵"和自我控制的精神。通过存异求同,化解矛盾,消除文化中心主义,使各种 文化能够共存共处, 进而达到"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的境界。当然, 中华文化的特色不仅仅包括费孝 通强调的这三个方面。他感到目前我国对中华文化本身还缺乏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系统知识,这是后人 应当继续努力的一个课题,即"需要以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证主义的方法来真正认识和理解 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化"(费孝通,1999,14卷:408-409),要认真研究中华文化的特点是什么,在怎么起 作用。

从前面的叙述可以看到, 费孝通一直关注的文化问题研究, 在前后两个时期有不同的重点, 也有不同的思路。费孝通早期的文化研究主要从文化功能论的角度, 系统全面地揭示传统乡土文化对农业社会的正常运转发挥种种功能, 同时指出这些文化中存在的一些不利于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因素。随着中国工业革命的顺利发展和当今世界"多元一体"格局的出现, 费孝通的研究更多地是从文化动态论的角度, 指出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背景下中华文化与全球文化如何进行"文化自觉"的问题。他对中华文化自身的态度也有变化。前期他希望现代工业与乡土社会尽快结合, 对不利于"机器下乡"的诸多文化弊端的抨击比较多。现在他看到了经济全球化还缺乏与之相适应的现代中华新文化和比较成型的"全球性文化", 他希望从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化中能够寻找到一些仍然可以发挥作用的积极因素, 帮助建立新世纪的现代中华新文化和"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秩序。当然, 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

务。作为一位世纪老人,费孝通在晚年为 21 世纪现代中华新文化的建设和人类共同生活规则的建设,进行了点题破题的引导工作,并提出了许多值得继续认真研究的建设性的思路和观点。这将成为后人继续进行文化研究的新起点。

参考文献:

邓肯.米切尔主编,1987、《新社会学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

费孝通, 1999-2001, 《费孝通全集》第1-15卷, 群言出版社。

——, 2002, 《九二存稿》,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ISA 工作论文 2002, 002"。

张荣华编,1999,《薪火相传》,群言出版社。

张冠生,1999、《费孝通传》,群言出版社。

Wang, Yanzhong 1999, "Chinese Values, Governan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Present Situation." in Han Sung-Joo (ed.), *Changing Values in Asia*, *Their Impact on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Published by Japanes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Tokyo).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研究员,社会学博士 责任编辑:罗琳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建系 20 周年纪念会

2002年11月1-2日,南开大学社会学系隆重举办了建系20周年庆典。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始建于1982年,是我国重建社会学后第一批建立的社会学系之一,为我国社会学的重建及早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后一直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费孝通教授为南开社会学系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南开社会学系第一届系主任苏驼教授、以及杨心恒、孔令智、张向东等上一代社会学者也为该系的建立与发展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目前,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已有三个本科专业(社会学、社会工作和应用心理学),二个硕士学位授权点(社会学与人口学)和一个博士学位授权点(社会学)。目前师资队伍总数有 22 人,其中教授 8 人(博士生导师 5 人)、副教授 8 人。20 年来,南开社会学系已经毕业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生共有七百多名。许多人已成为国内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社会学系(所)的学术骨干,在国际社会学界中也有不少优秀的华人社会学者出自南开社会学系。

20 年来,全系教师承担了一大批重要的科研项目,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社会心理学、科学社会学、中国社会思想史、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以及人口社会学等领域中的成果尤其显著,形成了南开社会学系的学术特色。

来自国内 20 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社会学系(所),以及来自美国、日本、香港等地的社会学机构的代表们参加了南开社会学系 20 周年的庆典。系庆期间分别举办了"社会学与当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21 世纪企业、政府和社会论坛"和"21 世纪大众传媒与社会论坛"。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供稿)